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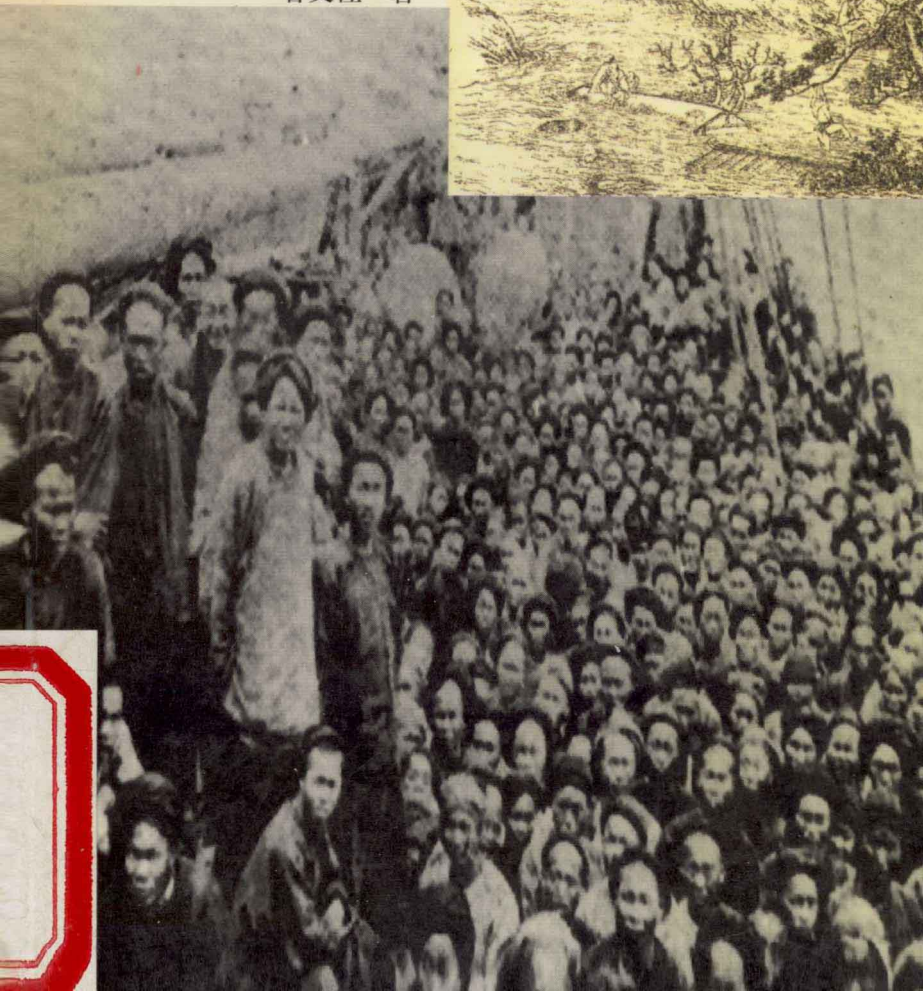
历史爱好者丛书 / 文化与社会系列

10

中国流民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主编
曹文柱 著



中国流民史

曹文柱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燕屏 仲伟民

封面设计:迪 赛

责任技编:孔洁贞 黎碧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流民史/曹文柱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7

(历史爱好者丛书)

ISBN 7-218-02171-9

I. ①中…②历…

II. 曹…

III. 流动人口—研究—中国

N. C924.24

中国流民史

曹文柱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总代理发行

广东粤中印刷公司印刷

(厂址:佛山市普澜路)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95,000字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218-02171-9/C·62

定价: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愛國

好

心

應

現

史

家

胡
說

作者简介

曹文柱,男,1945年生,北京市人。1967年大学本科毕业,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学术研究工作。著有《胡汉分治》、《治乱嬗替》,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事件卷》等。另发表中国古代史论文数十篇,散见于各类学术刊物。

《历史爱好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宋德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和(常务)

孔德龙 张亦工

宋德金 林建初

姚玉民 高世瑜

廖晓勉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 and 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

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史中的流民活动 ——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

- 一、从吴蜀民风的嬗变说起 (2)
- 二、流民活动和中华民族南北两大集群分界线的
南移 (8)
- 三、流民：祸兮？福兮？ (13)

第二章 关于“流民”的定义

第三章 中国古代流民活动的总势态 ——伏流与洪波

- 一、处于伏流状态下的流民活动 (24)
- 二、两种状态下的流民活动比较 (28)
- 三、中国历史上的流民洪波 (31)

第四章 “七亡”与“五逃”

——流民产生的原因

- 一、灾荒·疫疾 (38)
- 二、兼并·破产 (42)
- 三、重赋·苛役 (44)
- 四、动乱·兵燹 (49)

第五章 流民群体和各种类型的流民组织

- 一、处境悲惨的单家流徙 (54)
- 二、松散群体与合作群体 (56)
- 三、各种类型的流民组织（上） (57)
- 四、各种类型的流民组织（中） (61)
- 五、各种类型的流民组织（下） (65)

第六章 历代王朝治理流民的对策

- 一、严格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70)
- 二、赈济、减免赋役和整肃吏治 (74)
- 三、限制、遣返和镇压 (78)
- 四、控制、安抚和招安 (80)
- 五、统一安置流民 (82)

第七章 流民归宿种种

- 一、重新回归土地成为国家编户 (90)
- 二、其他类型的在籍人口 (92)
- 三、沦为豪门大户的私属 (95)
- 四、入城、进山和出海 (101)

第八章 流民活动的历史影响 (上)

- 一、使全国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变化 (107)
- 二、促进局部经济区域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
南移 (111)
- 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得到巩固与加强
..... (116)

第九章 流民活动的历史影响 (下)

- 一、流民活动与个别时期的政权体制 (122)
- 二、保存与传播先进文化 (125)
- 三、地区间人们社会观念与社会生活的交汇融合
..... (128)
- 四、神奇的客家人 (133)

中国古史中的流民活动 ——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

- 东晋以来,吴蜀两地的民风为何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 中华民族南北两大集群的分界线为何不断南移?
- 原因很多。其中,中国古代流民活动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从吴蜀民风的嬗变说起

三国归晋后，晋武帝发现孙吴和蜀汉两地的民风截然相反。他对统治蜀地的过于顺利非常惊诧，曾有过“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和“蜀人敦朴，易可化诱”的议论。关于这一时期“蜀人懦弱”记载，在《华阳国志》、《晋书》等典籍中能够找到很多。总之，在统治者眼中，蜀人是听话的顺民。与此不同，江南的孙吴旧土却频繁闹事。晋廷深感苦恼，武帝又发出了“吴人恣睢，屡作妖寇”和“吴人轻锐，难安易动”的叹息。史书中有关江南社会风气轻悍好斗的例证，比蜀地民风懦弱的记载更要多些。春秋时期，这里分属“同气共俗”然而又交兵不已的吴越两国。当时，越人以“锐兵任死”称著，吴国则靠“百姓习于战守”而名震中原。从战国到秦汉一统，时光荏苒，五六百年，江南虽然历尽沧桑，社会风气却依然如旧。《汉书·地理志》这样概括吴地风俗：“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直到东汉末年仍是“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三国志·吴书·华覈传》）。左思在《吴都赋》中描述孙吴时期的江南为“矫材悍壮，此焉比庐。捷若庆忌，勇如专诸，危冠而出，竦剑而趋”。庆忌和专诸都是古代著名的勇士，左思用此借喻这里的民风强悍。西晋统一后，武帝为安定江南社会秩序，恩威并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效果并不显著，仍是“窃发为乱者相继”。

然而自东晋以来，吴蜀两地的社会风气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蜀人不肯再作“易可化诱”的顺民，时而“侨旧翕

然并反”(《宋书·刘粹传》);时而“断流为暴,郡县不能禁”(《南史·萧鉴传》)。益州(今四川地区)刺史也由众人覬觎的肥缺变成望而生畏的“繁任”。蜀地民风由“敦朴”、“懦弱”一变为“乐祸贪乱”(《隋书·地理志》)。与此同时,江南民风则不断疲软。孙恩、卢循作乱时,晋军主帅不敢使用吴兵攻阵,声言:“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宋书·武帝纪》)。进入南朝,“南人怯懦”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到齐梁之时,社会上下,弥漫着文弱怯懦之风。官僚贵族“肤危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颜氏家训·涉务篇》)。甚至听到马叫“莫不震慑”,竟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不仅社会上层柔靡脆弱,就是一般百姓也不再“轻死易发”了。隋统一时,这里“君子(指上层人物)尚礼,庸庶(指平民百姓)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极受《隋书·地理志》的推崇。

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地理环境、生产条件、政治演变和文化背景的规定和影响。从横向来说,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是多因的、多层次的;从纵向来说,它又是一个文化凝聚物不断沉淀、积累、变化、解体的历史过程。笔者曾分别撰有专文,论述过吴蜀两地社会风气变化的原因^①。当然,造成社会风气变化的因素很复杂,但是其中,流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我们考察蜀人风气的变迁,有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特别

^① 详见《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文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和《蜀地民风的变迁》(文载《胡汉分治》,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

值得注意。这就是，西晋末年数万户秦雍流民涌入巴蜀地区，给当地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晋惠帝元康八年（298），由于天灾人祸惨剧的迭生，秦雍两州（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南部及青海黄河以南部分）的百姓无法正常生活，苦不堪言。略阳、天水等六郡的数万家民户，南下汉川，转徙益州，避难求生。他们有的为人做佣，有的生活无着落则“专为劫盗”。由于“流民刚戾，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饶”，侨流和土著的关系十分紧张。同时，益州地方官吏又火上浇油，逼令流民限期还乡，并在各城关设卡，搜掠流民的财产，还想杀死流民的首领。这就把六郡流民逼上绝境，他们遂拥戴豪强李特为主，铤而走险进行反抗。不久，流民军攻陷成都，建立了以成汉为名号的割据政权。战乱和突增的人口压力，迫使益州百姓抛离家园，流进出境。他们或东入荆湘（今两湖地区），或南下宁州（今云贵地区），前前后后累计有 20 多万户。而滞留在本地的土著民户则不到原来总人口的 1/10，六郡流民越居为益州人口的主流。

六郡流民的核心是拥有强大私人部曲（依附于豪强的亦农亦兵的百姓）的郡豪和酋帅，基本成员是汉化不久或正在汉化的豪氏。他们与原来蜀地的土著，人口气质有很大的不同，其“俗性剽勇”，“资剽窃以全生，习粗悍而成俗”（《晋书·李特载记》）。两种习性不同人口的置换，对于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不能低估。而恰在成汉瓦解之时，原居住在西南边地的僚族人因“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纷纷徙往益州。他们“挟山傍谷”，多达 10 余万落，仅归顺政府的“北僚”就有 20 万户。僚人正处在氏族社会末期，文明程度很

低，社会风气相当粗野，“喜则群聚，怒则相杀，虽父子兄弟，亦手刃之，递相掠卖，不避亲戚”（《周书·僚传》）。僚人习俗和秦雍流民风气互相影响，羼杂感染，自然造成蜀地社会风气大变。

至于在吴地，由于北方流亡上层人士的介入，使得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发生巨大变化，对于腐蚀自身及软化整个社会风气起了决定性作用。

今日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然而在上古，这里属于最为落后的瘟疫之地，“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由于财产分化不明显，氏族旧制得以长期保存，血族复仇遂成为当时江南人的牢固观念。在他们看来，弃仇不杀不仅愚蠢，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越灭吴后，越大夫文种历数吴王夫差六大过。其一竟是不杀越王勾践，为父报仇。另外，图腾崇拜、迷信鬼神也养成了江南人喜欢自残和对武力的盲从观念。吴越两国都有“断发纹身”的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习俗又演变成原始尚武精神在自身肉体上的炫耀和宣泄。《淮南子·泰族训》里讲到，江南人常常刺破自己的身体，然后在刀伤处缠紧皮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民众的好战尚武符合当时江南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他们对此大加树立和引导。于是这一观念逐渐熔铸成全社会普遍承认的行为规范。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把这种外在的规范，移入内在的心理之中，日渐凝聚成为一种群体的心理意志结构。秦汉以来，政治背景天翻地覆，但几百年积聚下来的心理素质并未马上随之改变，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到三国

分立,孙吴政权依靠土著大族力量割据东南一隅,实力与敌国相差悬殊,只能以武治国,这就使江南社会各阶层固有的尚武精神,更加蔚成风气了。控制孙吴局势的江南大族分为文化士族和武力豪宗两股力量。武力豪宗自不必说,就是那些所谓文化士族,如吴郡的顾、陆、朱、张四氏,其重视武力的程度也远胜于对文化的兴趣。西晋统一后的江南骚乱,虽然有以下层民众的自发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利益受到危害的江南统治集团鼓吹发动的结果。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沦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争相厮杀的战场。为逃避杀戮,大批北方汉族人口成为流民,纷纷南下。此时的流民包括的社会阶层十分广泛,上自百官公卿、大族豪强,下至普通民户。北方流亡大族凭借政治和军事的优势,反客为主,迅速在江南地区建立了以他们为核心的东晋政权。东晋一朝,国家的实际权力始终牢固地掌握在北来大族的手里。原处于主导地位的江南土著大族受到排挤,成为他们的附庸。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后期。

除土著大族在政权中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外,他们还经历了一个对北来大族由仇恨抵制到屈从依附,乃至崇拜模仿的心理变化过程,并最终消灭自己的固有特征而同对方合流。最初,江南大族的心情比较矛盾。一方面,迫于北方异族的威胁,需要一个偏安的汉族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这些“亡官失守之士”凌驾于自己之上。开始他们对东晋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那些武力豪宗干脆以起兵形式进行反抗。然而反抗活动相继被扑灭,在东晋政府的召诱之下,土著大族终于向北来大族屈服。